

宋育仁银行思想简论

董凌锋

(解放军出版社 星火燎原编辑部,北京 100035)

摘要:倡导经济变革、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宋育仁亦心怀忧国之心,积极在经济改革方面立言立行。要求创办银行是他经济改革的重要主张之一,且其银行思想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而日益深化:一方面,他阐述了对银行及银行制度的认识;另一方面,提出创办“官银行”、“国家银行”等一些银行主张,梦想以此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尤其是金融侵略,夺回利权,实现富国目标。

关键词:宋育仁;银行思想;金融侵略;西方列强;国家银行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1-0049-06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道复,别号问琴、问琴阁主、鸱夷逸客,私谥文康,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1875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担任过翰林院检讨、驻英二等参赞、四川矿务商务监督、尊经书院山长、湖北土药税务总局督办、学部等五部顾问、国史馆代馆长、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四川国学院院长等职^①。维新变法乃宋育仁多半生追求的梦想,他以“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被时人誉之,在1885年写的《周官图谱》中,他就初步阐述了其维新改制的主张,这比康有为《托古改制考》早了十年;另一方面,他撰写了大量维新著述,代表作有《时务论》、《采风记》、《宋芸子先生政法讲义》、《经术公理学》、《借筹记》、《庸书》序等,其维新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此外,其著述丰富,包括经学、小学、时论、文学等诸多门类。宋育仁身兼维新思想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其维新实践主要包括创办商务、主讲自强、创办报刊、译介西学等领域,被誉为“川渝民族工商业创始人和报业鼻祖”、“川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以及“四川维新运动的领袖”。宋育仁晚年在政治方面日趋保守,主张复辟帝制,但在学术、文化、教育方面却成就极为丰硕。

宋育仁撰写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著述,如其写成于1905年的《经世财政学》是当时中国人编著的寥寥无几的经济学专著之一。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整顿税制、铸造金币、设立银行、发展交通等。宋育仁因“善办工商”之名,在维新运动期之初就被翰林院祭酒张百熙推荐到四川主持商务及矿务。到清末新政期间,他又因杰出的经济才华而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到湖北上任,负责掌管湖北的土药税务,后来他还因善于货币之学而被委派为北洋造币厂总参议之职。

收稿日期:2014-11-05

作者简介:董凌锋(1980-),男,山西忻州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银行思想是宋育仁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包括:其一,他对开设银行重要性之深刻认识;其二,他对设立银行的具体构想。他不仅在其经济著述中多次论及银行问题,阐述对银行的想法,而且在甲午战后国难当头之际(1896年)给清政府上奏折,提出应对空前经济危机的理财主张,其中就包括“开银行”。

一、宋育仁银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设银行之风愈演愈烈。从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至1895年宋育仁写成《采风记》时,北起京津,南至广州,东自上海,西达汉口的中国国土上,已经形成了密集的外资银行网络。这些外资银行通过吸纳存款、向清政府贷款以及发钞等三项重要业务,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而以钱庄、票号为主体的传统本土金融业,在与外资银行的交手中败下阵来,日益衰败,根本无法担负起发展民族银行业、抵御西方列强金融侵略的重任。

西方银行从入华伊始,就引起了有识之士对银行及银行制度的关注与思考。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英国的银行制度及其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旨在引起国人对西方银行优越性的重视。洪仁玕则最早提出设立银行的构想,他于1859年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兴银行”的主张;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也在19世纪60年代初提出创立银行制度的主张。随后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盛宣怀、丁日昌等清政府官员也都主张自办银行,甚至开始尝试创办银行,但都归于失败。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早期维新派人士,从抵御列强金融侵略、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建设银行的重要性,呼吁创办银行,并对银行的职能、作用、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可见,西方银行对华金融侵略的加深以及近代有识之士对此之反应构成了宋育仁银行思想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这促使他在甲午战争期间著成的《采风记》以及20世纪初写就的《经世财政学》等著述中,用大量篇幅阐述其对创办银行的见解,并且在给朝廷上的奏折中也多次阐明对创办银行及银行制度优点的认识,并积极主张由国家自办银行,以抵御列强金融侵略乃至经济侵略。

二、对创办银行重要性的认识

宋育仁对创办银行重要性的认识表现出时人少有的远见卓识,他一面看到设立银行的便利之处,另一面又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在华银行乃列强对弱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创办银行可以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金融侵略,与西方列强争夺利权。随着西方对华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他对银行制度及创办银行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一)西方驻外银行实为列强对弱国经济侵略的帮凶

宋育仁认识到西方在华银行的先进性与便利之处,也认识到了它们的实质是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帮凶,对后者的认识更深刻。

1894年,宋育仁出使英国期间撰成《采风记》,其中他以西方在华银行为例,记述了银行的先进性和便利之处。他认为,西方在华银行通过汇兑将洋商在华所赚之银合金磅寄欧洲,为洋商在华贸易提供极大便利。“洋人来中国,持金磅以兑银,化少数为多数,更以银合铜钱,买土货则本轻而利厚。以土货载还伦敦,或者南洋各埠,加制造,还鬻于中国,易银数十倍。悉寄于洋银行,银行以一纸汇票,合金磅寄欧洲,而用各商所寄顿之银,买生金运回本国,以资铸币”^[21362]。他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在华银行的作用,认为这些银行既防止了西方金磅之流失,又具有吸纳中国银两以生财、资助洋商贸易、购买生金以铸金币的功能,“洋银行所取,仍属中国市面所有之银。欧洲金磅行至洋银行而止,岁出无限之货,实未得彼一钱,徒敛内地之银屯聚商岸,资其善贾转辗取赢,而归根买金以去”^[21363]。至此,宋育仁虽未明言,但他对西方在华银行实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帮凶的看法已尽在其中。

1896年宋育仁在奏折中对银行的认识明显比出国期间更深刻,其中他认为“商之所至,即银行所

至”，且西方驻外银行为其国商人存放所赚之银以及汇款回国提供了极大便利，甚至银行还以所获之利润购买中国生金运回其本国，“英国属地商业极广，隐操地球利权，商之所至，即银行所至；商往各埠贸易，资挹注于银行，名有若干磅成本，实则但有一纸汇券寄来。不持一钱，以至就其地之货，赚其地之银，寄期于其地银行。银行即以寄期之财，转资各商成本，空中营运灌注不穷，时以所获之赢，收买生金运回本国”^{[3]卷5P4}。可见，宋育仁至此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西方驻外银行乃列强对弱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他虽不懂得西方在华银行有一定储备金，但是他所分析的因中国未设银行而导致遭受西方在华银行的掠夺是符合事实的。的确，外国在华银行，一方面收买足金，运回本国；另一方面通过吸存中国关税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主权侵占加金融掠夺。

(二)无银行授人以柄，有银行利权在握

宋育仁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因无银行授人以柄，列强因有驻外银行而利权在握。他批评了当时金融业的现状，“今之票号非银行也，金店、银号非银行也，今之银行亦非银行”^{[3]卷3P3}。进而提出：“中国不铸金币，又无银行，通用铜钱，三者皆授人以柄。外国铸币、银行相经纬，故能长驾远驭。商之所至，即银行所在。商贾贸易于所往，但在本国银行寄存一款，银行以一纸寄所往地分行，其分行就其地商业寄顿之财，转辗挹注。商至，则就其地之土货以计奇赢，就其地之银行以资程本，不必持本国之钱以去。其所获赢算诚交银行券汇，实银不运还欧洲，似乎其地之财仍未取去，但其利权在握，故所至皆享，而土人为服役。埃及、印度、阿洲、澳洲、南洋各岛，即中国前车之鉴。铸金钱与设银行相辅而行。”^{[2]364-365}这番言论主要从利权丧失的角度证实了设银行的重要意义，以埃及、印度等国家为例告诫国人，说明了无银行则利权为外人所把持的严重后果，反衬出列强因有驻外银行而利权在握，占尽优势。

(三)厘清银行与理财之间的关系

宋育仁分析了银行与理财之间的关系，认为“理财之要策，莫切于经商，经商之关键，首重于成本。商本之来源，取资于钱币，钱币之作用，总握于银行。无银行则各私其财而力不厚，各限于地而利不通，力不厚，利不通，则商业不能举”^{[4]卷1P5}。简言之，即宋育仁认为银行为理财之源头。另外，他又揭露了中国民间财力分散而不聚集的弊端，认为理财需要化散为整，化静为动，银行正有此功能，“中国之财，本不患寡，患在有私藏而无公积，有私藏，故各人自为计，故各人自为计。故理财之要，须化涣散而萃为整，又须变滞塞而使之通过，其作用机关，专赖设银行为销纳”^{[4]卷1P6}。维新运动期间，作为维新旗手的康有为也认为银行为理财之枢纽，可见宋育仁对理财与银行关系的分析触及了当时重要的经济命题，顺应了历史潮流。

(四)设银行乃解决国内币制混乱之举措

自晚清以来，币制日益混乱。宋育仁认为外国币制整齐而中国币制混乱的重要原因在于外国有银行而中国无银行，因此他疾呼办银行亟不可待。“各国兼行币票，四海密如，惟其有银行之故；各国泉币金银铜三品相权，均有一成不易之价格，未闻铢铢而称之，有平色之差，为中饱之利也，惟其有银行之故也。我国议行币票则不行，曰惟其无银行之故；议定币价则又不行，曰惟其无银行之故，然则设银行诚当务之宜，急矣！”^{[3]卷5P5}

宋育仁把设立银行作为整齐币制的重要举措，显然这是他对当时货币制度混乱之客观局势观察思考后得出的对策，符合当时的经济状况。自晚清以来，币制混乱，国际银价不断下落，金贵银贱现象日趋严重，这对国家的货币制度产生了极大冲击，严重困扰着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遂有人提出改革币制、行用金币、皆用币票等主张，但国家财源甚少，纯粹依靠国家财政来改革货币制度已不可能，这就要求必须设立国家银行，为货币制度改革提供强大的经济后盾，于是宋育仁从整顿币制的角度呼吁设立银行的主张就产生了。

此外，宋育仁批评了当时银行招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认为中国办不成银行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商学知识，并对银行的分类作了介绍，“今欲举银行，不知非中国不能办银行，乃商学之程度不足以语

银行也”^{[3]卷3P3}。

三、宋育仁创办银行的构想

(一)设立“官银行”

甲午战争后,一些官员把办银行作为重要的自强之计上奏,如顺天府尹胡燏棻建议:“京城设立官家银行,印行钞票,而存其现银于银行。”^{[5]281}盛宣怀也上奏强调了兴办银行的重要性:“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5]440}维新志士陈炽、严复、梁启超、康有为也撰文阐述银行的重要性及银行制度的情况,主张创办银行。倡导设立银行成为甲午后少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值此背景,宋育仁于1896年上了名为“国用孔殷,民生日困,急须理财补救时艰”的奏折,折中他明确把“开银行”作为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之一,明确提出“设官银行”。他认为,外国有银行处处尽享便利之处,在对外贸易中尽占优势,而中国无银行,在与列强的贸易中倍受损失,且利权为其所握,并且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创立官银行的六大优点,“非设官银行无以操平准。设官银行,凡有数利夺洋银行之势,足以制欧商营运之权,其利一;出口货与入口税皆可收金磅,以资银行成本,其利二;所铸金磅寄储于银行,接济不穷,转输又便,其利三;内地解截支拨,统归银行出纳,既不致存为朽蠹,又免转运之烦费,经手之侵渔,其利四;有官银行为主,商家入股或另设分行,亦附于官,一气相联,随地兴工拨饷,应手立办,其利五也;民间有钱,皆得寄生生息,程本既益而商业、民业随地可察盈虚,其利六也”^{[3]卷5P4}。宋育仁对设官银行优点的分析,主要从与洋银行争夺利权、增加进出口收入、促进工商业发展等几个角度阐述,讲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把创办银行作为抵制列强金融侵略、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从他对创办银行重要性的认识明显要比出使前更深刻,这显然是他出使期间对西方银行直接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

(二)创办“国家银行”

甲午战后,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于1897年成立了,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金融业的起步,对于打破列强对中国的金融垄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未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与列强在华银行形成有力竞争,无法抵制西方的金融侵略。因此,一些维新派人士和民族实业家及部分清政府官员提倡创办国家银行,如容闳、张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育仁应时而动,于1903年写下《设银行以筹商本简明章程》,阐述了建立国家银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他认为国家应该掌握银行之利权,并且从理财及建立商部需要大量资金等角度阐述了创办国家银行势在必行,“窃维银行为国财出纳之总司,即商本转输之通汇,实理财之管轮,而国家应收之利权也。伏闻谕旨注重理财,拟开商部,如仰给国币,则收效尚迟,而度支易匱,如全仗招商,则希望者厚,驾馭甚难,谨拟银行简明办法八条开陈于后”^{[4]卷1P6}。

从甲午战后主张设立“官银行”到20世纪初建议创办“国家银行”,宋育仁对银行的认识和思考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其经济素养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关于创设银行的具体构想

至于具体创办什么样的银行,如何创办银行,宋育仁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银行构想。

1. 仿照外国银行章程创办银行

宋育仁明确提出以具有先进性的外国银行为参照,仿照其章程来筹办中国自己的银行,“拟请详照外国银行章程,就京都及各省会、各通商码头开设银行,招商共事,但设司事,不用委员,一切照商规,不用官法,银行主计司事人等,优定薪水,办事五年以上,酌加薪水一半,十年以上加薪一倍,年终会计赚项以百分之五按薪水奖办事诸人。外省总银行由督抚拣派晓习行务委员,按季清帐一次;其汇兑款项收存官民,寄本生息各式俱照外国银行章程,悉交银行主计办理”^{[3]卷5P4}。从中可以看出,宋育仁所提

出的创办银行的举措,主要是从银行设立的地点、银行的运作方式、人事制度、对银行的监督几个方面所考虑的,其中他提出的由官商共股、按商规办理、加强对银行的定期监督等主张都是直接向西方银行学习,这对于中国自办银行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2. 对银行总、分行的具体规划

宋育仁对银行总行及分行的设置及管理进行了构想。“一、总行宜隶商部也。外国国家银行,皆隶于商部。宜悉仿其例。二、分行宜就商埠也。宜就各埠商场,分别缓急次第开设,除京都为总行,附设商部衙门外,以天津、上海、香港、牛庄、芜湖、汉口、宜昌、重庆及各海关,凡商务较盛之处,即设一分行,遇有应行举办之商务,可以移缓就急,揖彼注兹,凡所需成本,如商股一时未集,即借资于银行,如本处银行一时不敷,即借资于他处银行”^{[4]卷1P6}。可见,宋育仁高度重视总行及分行的规划,他理性地规划了总行的归属和分行设立的具体位置,并对外国银行的相关情况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坚定地主张效仿西方银行,尤其对分行的创办地点及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划,体现了他对银行规划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反映出他较高的经济学素养。

3. 对银行经费来源的设想

宋育仁对创办银行经费的来源提出了设想,“经费借助公款也。今拟请拨官本五百万两,招合商本五百万两,合成一千万两,此为实本,以作银行起根。拟请将各省按年赔款,概交由银行司其出纳,向例赔款在限期三月前交海关道,此三月中,可以生息,计又得虚本银一千万两,如此一周转,银行之根基已立”^{[4]卷1P6}。他认为除吸纳官、商资金作为银行的基本资金之外,还可巧妙利用偿还欠款生息的方式,为银行积累资金,并认为如此则银行的根基就确定了。

4. 对银行职能的具体规划

对于银行的职能,宋育仁主要从出纳、汇兑、营运等几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对每一职能的优点进行了详细的点评,“出纳代理民财也。此条最为良法美意,筹国计而兼顾民生,国财流通,而民财亦资挹注矣!今将兴商务,必须平银价。在银行初立之始,先行权宜定价,偶有涨落,不得逾十分之一。藉此可以平银价,救钱荒”^{[4]卷1P7};“汇兑带行钞票也。非设银行,则币票不能行用;非有币票,则圜法不能流通。宜仿各国造票,发交国家银行行用,为专许之利,定法而约其中数。营运弥补国债也。赔款本属银数,又折合磅价,转而偿金,此中暗亏,以数千万计。赔款交由国家银行出纳,所议收买金磅,储备偿还,亦应由国家银行一手经理。其收买金磅之银本,拟请准由上海银行,随时查明价值,稟请商务部飭下税务司,分批划拨,交该银行收买存储,俾周知磅价涨落情形,则中国未铸金磅,已得用金之情形。银行未至外邦,先习外邦之交易,仍以银行应出之利息,给还税务,以免阻挠”^{[4]卷1P8-P10}。

宋育仁还认为银行的职能应包括,“司公款出纳;司民间与公款交涉之出纳”^{[3]卷5P20}以及“设汇兑银行以通钱币贸易”^{[3]卷5P29}。“补助以维公司也。扩充以通商旅也”^{[4]卷1P8-P10}。此外,他对国有银行的职责进行了阐述,“银行之大,较各国规制略同矣。国家银行平日则流通国币、发行钞票、代理民财、出借国债,有变则供给军需”^{[3]卷5P3}。

总之,宋育仁生活在一个积贫积弱、亟待变革的时代,追求富强成为当时国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也成为不少进步人士思考的重要主题。他身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寻求富国之策,把创办银行作为强国富国的重要举措之一,力主中国自办银行,深刻认识到银行乃与国计民生利害攸关之大事。他主张创办银行的重要出发点在于通过办银行来抵御西方列强的金融侵略、与列强争夺利权,其爱国之心昭然可见,而且关于创办银行的具体设想体现了他不凡的经济素养。从这个意义讲,宋育仁在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其银行思想也成为中国民族银行业发展中颇具价值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宋维彝.宋芸子先生行状[O].北平:石老娘胡同傅沅林先生捐,1931.
- [2]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3]宋育仁.经世财政学[M].上海:上海同文书社,1905.
- [4]宋育仁.经术公理学[M].上海:上海同文书社,1904.
- [5]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G].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The Brief Discussion About Song Yuren's Bank Thought

Dong Lingf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rairie Fir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To advocate economic change and pursue national prosperity are the consensus of people with breadth of vision since modern china. Song Yuren speaks and works actively in economic reform with sorrow heart. To ask for the founding of bank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about economic reform, and his banks thought became deepening a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one hand, he expounds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banks and banking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he put forward some claims, such as the "official bank" and "national bank", he dreamed to resist economic aggression, especially financial aggression, retake economic rights and realize national prosperity.

Key words: Song Yuren; the bank thought; financial aggression; western countries; national bank

(责任编辑 张春生)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以及其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